

王国维之家境与前期生计考论

彭玉平

摘要 按照生计与学术之疏密关系,王国维一生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以学术为主,生计为次;后期则须综合兼顾学术与生计两端,无法过于轻重其间。王国维家境一般。据王国维自述及其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其一年收入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田租与房租是支撑其早年家用的基本来源,然收租诚然不易。王国维因许家惺之荐任上海《时务报》书记,月薪微薄,令王国维颇为失落,后兼译东文,始觉生计稍安。此后任教通州与苏州两所师范学堂,又赴任清学部总务司行走,此数职事所取薪也只是应付日常生活而已。辛亥革命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寓居京都四年余,大体以理书、编刊、撰述等为生,生活安定而俭朴,学问则日见其大。先有生存,才有学术,梳理王国维早年家庭经济以及其早期生计情况,对于了解王国维如何权衡学术与生计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王国维;罗振玉;《时务报》;《观堂集林》;通州师范学堂;京都

中图分类号 K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4)03-0103-12

生活与学术的关系,有时可以非常直接,有时虽非直接,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彼此关联着。1916年7月12日^①,王国维致信罗振玉云:“《礼》是鲁学,汉初经与颂均出于鲁,不知当时礼家先师生活状态如何,殊费人研究。凡类此者,皆极有关系而极难钩稽者也。”^[1](P151)“礼”当然与礼家的生活状态关系密切,所以王国维特别关注。但实际上,“生活状态如何”对一个学者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即便不体现在学术研究的对象上,也会对研究者的生存方式和日常心境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哲学、文学、古文字学、古器物学以及传统经史地理之学等多方面取得了划时代的贡献。在王国维那里,生计问题似乎始终是第二位的,不妨得过且过;学术研究则是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的,努力精益求精。王国维一直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与精力有限,若以学问为人生价值和意义所在,就需专力治学。若分心旁骛他事,则未免得不偿失,影响到学问的格局、境界与发展。

王国维在任职《时务报》期间,前任书记许家惺曾致信王国维,大意其弟许嘯天(即后来之“鸳鸯蝴蝶派”名家)想来沪上东文学社就读,因经济窘迫,请王国维同时为其在《时务报》或农报馆中另觅一事以作津贴。王国维回信说:“令弟既欲为学问事,似不应兼办他事。”^[1](P6)王国维自己深受半工半读之苦,当时他在报事之外,每天读东文三小时,兼办学社庶务,“几无暇晷,于学问丝毫无益”^[1](P5),而且兼职所费的时间精力与经济所得也不成比例。所以,王国维一生的经济困境并非是其完全无能力创造财富,而是觉得天赋心力既然集聚于学问,于学问之外的谋生之道便不能不有所疏阔。

但大师并非可以超凡脱俗餐风饮露,同样需要基本物质生活的保障,经济状况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或许因为确实倦于疏于治生,与形如泰山北斗的学术地位相比,王国维的一生几乎都没有解决财务自由问题,生计问题始终如影随形困扰着他。王国维晚年任教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月薪400元,在当时不可谓不高,但他在遗书中告诫三子贞明:“无财产分文遗汝等。”^[1](P733)其实,更精准地说,王国维还

① 为了引录史料方便,讲述简洁,本文提及的年月日期,除非特别指明为公历,皆指中国夏历。

不是有无财产金钱遗留的问题,而是生前经常负债的问题。1926年8月30日,长子王潜明因患伤寒突然去世,王国维与罗振玉皆南下上海料理丧事,丧事初毕,罗振玉即悄然携女罗孝纯北归。1926年9月18日,王国维致信罗振玉说:

此次北上旅费,数月后再当奉还。令媛零用,亦请暂垫。维负债无几,今年与明春夏间当可全楚也。^[1](P460-461)

1926年12月30日,王国维在致陈彬信中也说:“去岁弟因长儿之变,于外稍有欠项。”^[1](P725)王国维预计要到1927年春夏之间才能还清债务,而在1927年5月3日,王国维即自沉昆明湖了。如果考虑长子丧葬诸事、长媳罗孝纯北上旅费及此后生活、到海宁为长子王潜明购置墓地等种种费用,要用半年多时间在此前负债的基础上完成这一切,王国维的经济压力可想而知。以此而言,自沉前夜王国维在遗书中说无财产分文应是事实。这也意味着王国维在拮据中度过一生,也带着经济的负累怅然离开这个世界。

王国维晚年经济情况如此,其实其海宁家境与早年生计也充满了艰辛。大体而言,就生计与学术的关系而言,王国维的一生可大致以丙辰(1916)年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王国维对生计的考虑基本停留在简单的衣食住行等问题上,他只是相当随性地以一种简单的职事谋取基本的生活资源,因为家庭与生计的关系尚不构成王国维生活的主要内容;从丙辰年初回沪后,在基本的衣食住行之外,一个家庭日常所需要面对的子女读书、结婚找工、师友交际、人情来往等,都是王国维必须面对的现实,生活费用剧增,生计问题的重要性在王国维的生活中日益凸显,王国维不得不更加积极地谋事以谋薪,对经济的期望值也更增。当然,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无论王国维怎样努力,生事之累始终是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这是我们在关注王国维极高明学术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其极俭朴甚至很艰难生活的重要原因。用最简单的生活支撑更丰富的学术,其中有非常值得敬重的王国维学术精神。

一、早年家境与财务状况

粗检王国维生平,经济拮据甚至贫困几乎通贯一生。王国维家境原本就一般,他自述“府君少贫甚”,早年在上海“茶漆肆”学习经商之道^[2](P67),曾游幕溧阳多年,俸禄低微。王乃誉自己曾说:“余年于溧署,艰苦为难,几几不能自存。”^[3](P1845)后来情况稍有改观,但也不过略副衣食之需而已。王国维说:“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2](P118)这“一岁所入”主要指田租与房租两个部分,兼及养蚕^①等,似也曾与人合资在盐官西门办一盐舍^[3](P671)。今存《王乃誉日记》所记,每至岁末年初,颇多王乃誉、王国维收租之事,然多不能如愿^②,“各租欠者视为故常”^[3](P157),如1893年12月除夕二更后外出收朱珍三、汪祥昌、顾斗标三家房租,即分文未取到^[3](P275),有时甚至被租客欺负。略引《王乃誉日记》1891年12月除夕记云:

早,与静出北之园,静取顾租不得……并账恒裕、致中……又同静持灯北至顾斗标剃店,至再说,只付半洋。恒裕小坐,之汪瞎子祥昌讨取旧账,不但本不肯付,即息丝毫不偿,且出言

① 按《王乃誉日记》1896年4月初8所记,当时茧每百斤33元,质量差的也就28元^[3](P648)。

② 如《王乃誉日记》1891年2月30日记云:“晨挈静同出……转恒裕北入顾斗标讨房租不得,嘱静还。”^[3](P28)这便是收房租而不得之例。《王乃誉日记》1891年11月5日记云:“静安至运洞口讨地租,不得。”^[3](P103)此收地租不得之例。《王乃誉日记》1891年11月28日记:“午后,又挈静出南门看做柴盘,入轧大行取租四元……令静至东岳庙取高租不得。”^[3](P111)此同时两取租而不得。《王乃誉日记》1891年12月除夕记云:“早,与静出北之园,静取顾租不得。”^[3](P124)同年12月1日记云:“黎明起,租船户谈小毛来,周六亦到……与静儿出,市船菜,抵苕桥,濂溪在竹行候,偕遂下舟于宜桥,待周六……由郭溪西乡桥入西港,至封家桥叶佃姚祥家,量租三石九斗;见李氏之子,同至蚂蝗桥周凤山佃量租三石,又周加福量一石;西旁沈佃家始存妇女……出看泥谷居半,斗谷又须大减,议未定,时久之,王关昌、李老二中至,劝之不应……又量余田,米四石四斗。时又晚焉,关昌乞看河西田一行,回即与关昌议。”^[3](P113)此是王乃誉、王国维父子下乡收租之例。

狂肆詈人,令人发指。稍稍与论,伊妻尤泼,大为诟詈,惊聚路人。^[3](P124)

这样的情况并非偶然,而是经常发生。兹再举1897年12月除夕之例:

午后即出讨取各账……二更讨王关昌尾找,致与争执。盖呼之不理,乃追索要之。久之,始出付一元六角,尚欠八角。而蓉舫目见不理,其纵容无忌有所自来,然其宠纵刁工至极,或中有别故,不可解也。三更出国致语划十元酒账,晤楚卿,过顾租户,其妇一味恃蛮,谓为未欠多出,不协,恶毒之语,置新旧欠租于不认。一再导迫,更见泼蛮……^[3](P810)

原本是正常的收租,结果租户有的不仅本息不付,甚至辱骂户主。有时虽能取回部分,但并不足数。《王乃誉日记》1895年12月2日记云:

黎明至马杏林家,七毛至街,其妻与其妻母陈苦状,乃量米二石二升,少欠五斗,约明蚕罢归还……放舟至王关昌家,其妻仅仅出四元,只抵米一石零,而取租应四石,所差巨,飭寻关昌不至,与说舌敝唇焦。^[3](P594)

能全额收回租金或米者极少,“我租我欠,十不还九”^[3](P603)差不多是常态了。后来偶尔近年关,估计从有些困难户、刁钻户收租无着,干脆就不费心劳力去收了。1899年12月除夕,王乃誉在日记中说:

于珍三、汪祥昌、沈连生各欠皆不往,以往徒费唇舌,必无得,雨中省此行并烦恼。^[3](P1156)

这该是何等的无奈。当时全家年用在200金以上,王乃誉颇有家用难支之忧,若年度特殊情况多,则支出更多,如1896年竟用去600金以上^①。《王乃誉日记》1892年正月元日记云:

三更风声猎猎,雨止,静夜思吾家年用非二百余金不可,若加帮款闲费尤不止此,况儿女日长,婚嫁事起,读书馆缮,实属不支。惟有力求撙节,开源节流,期于敷用,则此生万幸矣。^[3](P127-128)

这尚是在不计“帮款闲费”的情况之下,故“力求撙节,开源节流”成为王乃誉安排家用的基本原则。当时新春拜年的户数就有44户之多,即此可知家用之大。当王国维年近婚期,王乃誉对生计的担忧更见其形。《王乃誉日记》1896年7月26日记云:

与内子议及静姻事,迄无措手,既无大宗款可提用,而计非三百余不可(事事俭陋),一难;婚后房内一无蓄,将何为继?二难;此学成或艰,且十年不成,更无属望,诺大一家钱短而人加,三难。年用尚勉敷,一短则窘可立见,无事可减省,筹措再三莫能定见,况后变逐出。^[3](P691-692)

平时年用已是勉强,稍有短欠,家用就显窘迫,而婚事更是需要大宗款,王乃誉的担忧在此,他更有“年壮者于资不理睬,甚恨,甚喟。将后不独难继,恐渐入中落”^[3](P693)之忧,对王国维于谋生的淡漠深表不满。王国维当然素知家用情况,故其三十之年撰《自序》,已深为感叹“生事之累”^[2](P118),贫困也因此成为王国维早年治学挥之不去的一种困扰。

^① 《王乃誉日记》1898年2月20日:“在楼完前岁账,计喜事及姑母除灵入祠、健儿联姻、粹甫丧事,共已六百余元。其年丝吐蚀本未售,盐舍全无本利。此年之用儿不可设想。”^[3](P841)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王国维从上海、杭州等地报刊上了解到风起云涌的新学,深受鼓舞,他很想走出海宁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但因“家贫不能以费供游学,居恒怏怏”^[1](P119)。王国维意识到要致力于新学问,就必须开阔眼界,增长见闻,但因为“境之贫薄”^[2](P120)而无法达成远行游学的心愿,这对他的治学和心理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任事《时务报》书记及经济困扰

王国维走出海宁获得的第一份工作是担任上海《时务报》的书记,薪金低微,月仅12元。1898年正月下旬,因姐夫陈汝聪之堂弟陈汝桢托许家惺推荐,王国维接替同乡许家惺入《时务报》为书记,正月薪水仍归许家惺,王国维从2月开始取薪。就现存《王乃誉日记》可知,1898年正月12日,王国维“招许默斋同之松风茗叙”,商议赴沪之事。两日后许家惺赠王国维浙江全省舆图,元宵节许家惺来访不遇,正月24日晚,王国维从盐官出发去上海,许家惺亦来送行。许家惺年长王国维4岁,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人,因四次乡试落第遂绝意科举,至沪从事新闻工作。“廉泉一勺愧清贫”^[4](P34),经济颇为拮据。王国维一到上海,同样面临经济困境,因“出门时旅费所带无多,另用苦于不继”^[1](P4),又因拟往东文学社学习日语,只能向报馆借款6元以缴学费^[1](P4)。更大的问题是,前任许家惺在馆中月薪20元,而接替其职、同任其劳且另增其他事务(如改东文、写信、校书、代作文等)的王国维却月得仅12元,薪水不增而“反加减焉”^[1](P12),“所入不及一写字人”,王国维自然为之不平^[1](P5)。因为“此地脩瘠”^[1](P11),加上当时已有“米价奇昂,小民万难度日”之感^[1](P8),使王国维屡有易职之心,过于吃紧的经济状况已经影响到王国维对学问的专心了。1898年3月5日,王国维致信父亲王乃誉、许家惺及汪仲谷等,多方倾诉,对同工不同酬深为不满。《王乃誉日记》1898年3月26日记云:

接静儿五号信,知脩祇送正、二月廿四元,月十二元,大相径庭为异,决去留于余。有致许默斋信,又汪仲谷亦有书,内述诸各减少致此,似静亦作议,只好如此矣。^[3](P871)

薪水如此之低惊到了王国维,也同样让王乃誉不解,所以王国维“决去留于余”,征求其尊人的意见,王乃誉似乎也只能听凭王国维自行决定了。后来还是朱稼云与许家惺商量,将两个月薪水一并归王国维,此事方算有了着落^①。稍后,王国维又为东文学社同学潘士裘笔述法文,另得月修四元,藉以小补^[3](P880)。

不过,许家惺与王国维的情况确实有所不同:许家惺来《时务报》任事前即以受业的身份与汪康年通函,对振兴中国的话题和国际政治特感兴趣,对《时务报》和主事者汪康年充满了敬仰之情,一度还通过汪康年从沪上购置西学书籍。1897年6月,许家惺致函汪康年,表达了希望来沪谋职之念。接信不久,汪康年即招许家惺来沪,但此时许家惺因承其尊人海宁衙门之职席,一时无法到沪。他在当地专司记室,撰集文件,参校书籍,月脩20番;此外还受聘参撰海宁县志,酌送纂脩^[5](P3306-3307)。这意味着许家惺来沪前的月脩就不止20番。许家惺既不能把海宁的职务率尔请退,面对汪康年悬缺以待的回函,只能请汪康年或先请人以任,或稍假以时。总之,许家惺表达了极愿来沪的愿望,只是一时无法抽身而已。汪康年一再驰书相召,终于让许家惺决定辞去海宁职事,并于10月到沪。但在1898年元月,许家惺因故只能匆匆离开报社,王国维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来到了《时务报》。1898年3月,许家惺致信汪康年云:

王静兄早赴台端,谅称得手,一切能资臂助否?上望大人左右之。^[5](P3308)

许家惺当时只是临时离开报社,按照原计划,数月后再返报社。这也意味着王国维就职《时务报》从一开始就是代理性质,并不具备稳定性和长期性。但许家惺回家后族事乡事频仍,一时无法按期回沪。

^① 《王乃誉日记》1898年闰3月4日附致王国维信:“昨以稼云画扇付还知尔馆脩。伊复,已与默兄商定全归汝收矣。”^[3](P877)

1898年3月,许家惺致信汪康年云:

……可否仍著王君权理此席,静安兄年少有志,俾得常聆教益,或他日有所成就,亦出自大人之赐。且王君雅意殷勤,脩羊所得,仍得分润受业。在大人惠赐得以均霑,在受业亦不无小补,且可周旋旧主,皆拜德于无既,一俟可以抽身,得当飞诣前来,受业故每饭不忘绛帐也。顷接王君函,询及脩事,大约大人以受业不久到馆,俟受业面领,益仰虑念周匝,铭勒无似,可否即请照数致送王君,以应其需,容冬惠济一款,即在其中扣除,免由局寄,以节邮资,不识以为何如?一切业函致王君接洽矣。^[5](P3309)

“可否仍著王君权理此席”云云,很可能当时许家惺与汪康年的请假商定只是两三个月,结果约定期满,许家惺仍无法到沪,故请汪康年再延王国维任期,同时也再度表达了“一俟可以抽身,得当飞诣前来”的意愿。则若许家惺果然按时飞诣前来,《时务报》如果不增加职位,就意味着王国维要另谋出路了。

据今而言,王国维的学术成就当然远在许家惺之上,但论当时文笔佳胜以及与汪康年之关系,尚稍逊于许家惺。许家惺与王国维尊人颇有往还,曾赠书王乃誉,王乃誉对许家惺评价甚高,1898年闰3月28日,王乃誉在日记中说:“默斋天资学问及与静较高,而之开展又过之,少年中之铮铮,将来必有所成立也。”^[3](P891)觉得其才华天赋阅历皆在王国维之上。再者,许家惺来《时务报》前,月脩即不止20番,来沪谋事乃出于情怀,论收入较海宁还有所下降,而沪上所费却在海宁之上。王国维乃初次出道,知道自己“系为阁下代庖”^[1](P5),暂行代理许家惺的工作。相对而言,“正式工”许家惺与“临时工”王国维还是有所区别的,汪康年只付王国维月薪12元,可以理解。同工同酬只是一种相当纯粹的理想,回到现实,考虑的不止同工这一件事情了。王国维与许家惺两人同任一事,而账房戴恺翁所致正月、二月薪水,除去各项预支预付,仅余11元,王国维方知自己月薪才12元,为两人同任其事而薪酬“前后多寡悬殊若此”而深感困惑^[1](P5)。汪康年其时还一直期待着许家惺重回报社,对王国维有所怠慢的原因或许也在这里,而王国维显然低估了关系与经验在酬金中的重要作用。在赴沪任事前,王国维只是在1896年正月19日被聘为沈楚斋馆塾师,薪资不详。许家惺推荐王国维任事《时务报》,为王国维谋取了第一份临时职业,微薄的薪资令王国维倍感生活的艰难和屈辱。

王国维对《时务报》并不陌生,早在1896年7月1日,即有名陆闰生者,在写给王国维的书信中,附有《时务报》条规^[3](P680)。1896年9月5日、7日,王国维持《时务报》第1册、第3册与第4册,1897年11月14日携《时务报》第45和第46两册与父亲王乃誉共读。王乃誉对梁启超所陈变法之议,深为赞同,只是担忧其成效^[3](P707)。此可见其父子对《时务报》共同的关切。这还仅是《王乃誉日记》存有记录的情况,若平时阅览而未曾记入日记的肯定也有不少。

似乎最早是同邑朱稼云传递了关于去《时务报》的消息,时在1898年正月11日或此前,王乃誉获悉此事,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为之跃然,第一感觉就是“应速为静谋”^[3](P816)。次日王国维应朱稼云之召,但竟然未遇,随后即与许家惺同赴松风茶叙,许家惺同意向《时务报》推荐,王乃誉认为“此若冀成沪上,乃可立足”^[3](P816),对王国维可能的赴任《时务报》表达了很强烈的愿望。1898年正月22日,王乃誉获悉王国维可任事《时务报》,即开始为之添衣置装。1898年正月24日晚,王国维在父亲王乃誉陪同下坐船从海宁出发,朱稼云、许家惺同来送行。26日天明抵上海龙华,上午到《时务报》馆报到,入住永保客棧,王国维忙着入报社诸事,王乃誉则“拟留数日,认昔时爪印”^[3](P825),盖一访当年任事沪上“茶漆肆”之故地等,2月3日,王乃誉离沪返里。

据《王乃誉日记》1898年4月24日所记,4月22日王国维致信王乃誉,告知五六月一作归计。5月22日又信言归期未定。5月23日又致信告知,推荐姐夫陈汝聪(达衢)替代自己《时务报》之事,同时王国维也已接译东文日报事,希望陈汝聪三天内赴沪,大致代理20天,然后王国维再接续报事。王国维5月28日从上海启程(同日陈汝聪到沪),于30日抵家,“人极狼狈,腿病竟不得起立”^[3](P920),因比较严重的鹤

膝风回家乡疗养,在报馆工作时间前后累计也就4个月,实际所得只有48元。王国维回到盐官,以烧酒泡杨花、生姜,擦之腿部,渐有起色。1898年6月6日,许家惺来看望王国维,“静与语久”,薪金之事,当是彼此交谈的内容之一。另外,对于王国维的病情许家惺也有看法,认为医生以风病治疗,恐不合病情,次日乃约其友人姜启忠来诊断,大要在王国维之病根于体虚,所以在用药中加扶阴加龟版、狗脊、桂枝等,辅以针灸,以强其体力,期间王国维更发痧一次。因其时许家惺不能遽回报社,王国维一时也失兴趣,曾推荐姐夫陈汝聪以代,陈汝聪性格畏事,5月28日抵沪,6月5日即辞馆归家^①,大概因对相关事情不熟悉,故知难而退了^[1](P20)。此后一直到10月16日再次从海宁启程,于18日抵达上海。而此前6月中旬,《时务报》已被改为官办,汪康年因仿《时务报》旧例而另创《昌言报》旬刊^②。从5月28日离沪至10月18日再抵沪,王国维原计划回乡疗养20天,实际在盐官滞留了4个月加20天。这近5个月中,他与汪康年也颇有信件往返,现存信件倒未见关于脩金的话题。

1898年10月赴沪,盖因罗振玉函请。10月11日,王国维收到罗振玉来信,言到沪之事^[3](P990)。王国维或有迟疑之意,故延宕五日始启程。于18日抵沪后,藤田丰八和罗振玉升王国维为东文学社董事,酬金或亦一并有所提高。

三、兼任东文学堂庶务与译述东报

大概在1898年5月下旬,藤田丰八曾向汪康年之弟汪诒年推荐王国维为新创刊的《时务日报》(后改名为《中外日报》)翻译东报,商议初成,王国维未及任事就因足疾回海宁养病了。10月18日再抵上海后,一方面许家惺荐其为《中外日报》撰写“论说”专文;另一方面王国维也请许家惺向汪诒年推荐,希望能替报馆兼译东报,因为翻译“较作文颇不费心也”,并表示“日约可译千余字”^③。从王国维尊人王乃誉之日记可知,此事确已达成,兼职甬馆翻译,月薪8元^④,兼代许家惺之职,则王国维第二次入沪的月入应该在20元或以上。考虑到王国维的人品学识、工作能力和效率大概逐渐得到汪康年、汪诒年兄弟的认可,则代许家惺馆事的月薪有所增加,专职加上兼职,月薪或近30元,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898年3月6日,罗振玉创办的东文学社在农报馆对门萃报馆内开馆。但在开馆10天前,也就是1898年2月26日前,王国维即驰书父亲,告知即入东文学社,师从教习日沪上副领事诸律和农保翻译之藤田丰八,同入东文学堂者有同馆法文翻译潘士裘、魏藩室等^[3](P850)。征得汪诒年同意,王国维成为第一期学员,每日往学3个钟头。入读东文学社,须先送束脩10元,王国维因随身携款少,只能向报馆借款6元以应急需,此时他还未领取报馆任何酬金^[1](P4)。1898年9月9日,王国维致信许家惺云:“弟在此间蒙蕴公款留,唯素餐之刺常愧于心,且日用一切颇形枯窘。”^[1](P19)所谓“蕴公款留”,应是为王国维提供半工半读的机会,免其学费而已。罗振玉《祭王忠愍公文》云:“暨予立东文学社,公来受学。知为伟器,为谋月廪,俾得专力于学。”^[6](P232)罗振玉所谓“为谋月廪”,应是1899年11月后之事。1899年11月16日,王乃誉接王国维信,知道其“现译楚北申农报二人,月卅元。叔蕴又许其管学堂事,月廿元,伊辞谢六元,留情他日出洋资”^[3](P1136),王国维辞谢6元,则此时王国维实际月脩相加有44元之多。在海宁因病疗养4个半月后,王国维再赴上海,一年之后,职事与月薪都有了较大变化。而当初罗振玉的“款留”则是王国维居沪枯窘生活中难得的一缕阳光。

这期间,王国维在学问上表现出来的过人天赋引起了日籍教员藤田丰八的关注。应《农学报》译述日文之需,1897年初,藤田即由汪康年荐为翻译^[7](P96)。后罗振玉创立东文学社,又延藤田为教习,据

① 《王乃誉日记》1898年6月5日记云:“接时务申颂阁致静函,谓达到后不肯留而他适,殊为异。”^[3](P923)

② 《王乃誉日记》1898年6月22日记云:“看《申报》,内载《时务报》改为《昌言报》,系依旨据实昌言意。汪穰卿意‘时务’二字归国,报归伊而办也。”^[3](P934)

③ 参见1898年11月9日王国维致许家惺信^[1](P19)。

④ 《王乃誉日记》1898年12月5日记云:“静为汪颂阁荐甬馆日本翻译,月八元,又代默斋馆。”^[3](P1038)

说藤田教习东文“未受一文之脩”^①，而独赏富有学问之人。王国维1898年3月6日入读东文学社，6月初即受邀译述东文。何以在当时日语并不算精通的王国维，在仅仅学习日语三个月后就有信心翻译东文呢？6月7日，他致信汪诒年云：

穰先生及先生为国维学问故，俾译东文，至感至感。但馆中祇有日本报一种，新闻太少，尚须添购《大阪朝日新闻》及《东京日日新闻》二种，有东便祈定购为要。^[1](P20)

现在我们当然知道，汪康年、汪诒年请王国维翻译东文，是藤田丰八在其中起了推荐作用。不过因为王国维当时困于足疾，而未及完成译事。1898年11月9日，王国维重回上海后，曾主动请许家惺再向报馆荐译东文之事。他说：

犹忆今岁夏间穰公以藤田师之荐，为国维成就学问计，格外垂爱，令国维为《日报》馆译东文，甫有成言而国维以足疾归里。嗣后颂公来书，犹殷殷垂念，嘱国维痊愈后无论何时总可来沪，改译东报，国维诚铭感无地。逮此次出沪，闻《日报》已归曾君办理，穰公又新遭家国之变，未敢以此等事相渎。兹闻曾君入都，颂公接办报事，《日报》译西报之外，是否或需兼译东报？如蒙见使，甘效驽骀（日约可译千余字，较作文颇不费心也），明知选事而作古人所讥，唯宿蒙穰、颂二公厚爱，故敢以闻足下，祈代达焉。^[1](P18-19)

王国维不仅有浓厚的译述东文的热情，而且自信似乎也很高，其中当也有出于生计的考虑。1898年3月23日，王国维致信许家惺即已直言：因为兼任报馆和习东文二事，“学东文苦不能读熟，恐致半途而废”^[1](P6)。又说：“东文较西文诚易，但苦无暇读，因出馆后仍须温习，即有暇亦不肯读，是以不能精进。”^[1](P10)第一期东文学社学员共6人，经考核后，王国维的成绩排在最后。“果能专精事此，一年当能通之”^[1](P14)，但事实上困于生计的王国维不可能用一年时间去专精东文。在这种情况下，藤田出于爱才惜才，特荐王国维译述东文，主要不是因为王国维的日语水平有多突出，而是深知通过翻译东文，既能提升其语言和学术能力，更能增加其经济来源，以让王国维安心读书治学。

还需赘上一笔的是：王国维入《时务报》不到一周，就受到了粤人康有为弟子欧榘甲的厚待。这个欧榘甲在沪时间比王国维长，略知沪上情形，至少知道《时务报》并非可以久留之地，“劝其入翻译中西文报馆，以各高才荟萃之所，数月后或可大进，另图佳所”^[3](P830)。如此建议的原因，除了当时翻译中西文报馆聚集了一批高才，容易得到更多提升自己的机会，待遇较为丰厚也许是当时一因。王国维后来对译事如此感兴趣，其最早的启蒙可以追溯到他人入《时务报》一周之时。而父亲王乃誉则不苟同欧榘甲的建议，觉得既然入《时务报》，便要把这这一份工作完成好。他只是建议王国维“结好有学识及多财者，盖非是则终不能上达”^[3](P836)，希望能借助有学识与有经济实力者，帮助王国维出人头地，其中特别提到“多财者”，盖亦素知王国维疏于生财之道也。

王国维在东文方面似乎影响日甚，王国维1901年4月下旬从日本回来后，7月18日曾收到邵崇伯来信，坚请王国维到杭州养正书塾任东文教习，此仅见王乃誉日记所载，未见王国维对此之态度，但应未到任。1902年9月8日，王国维致信王乃誉，告知清末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字冶秋）托罗振玉请其任东文教习，张謇通州师范学堂也敦请王国维前往任教。而王国维认为自己学业未丰，不愿于心理、物理、哲学三项半途而废，所以答应迟一两年赴任。王乃誉则考虑到王国维身体柔弱，也只能听其自为。

① 参见1899年4月14日王国维致汪康年信^[1](P24)。当初东文学社拟请网本任教，据说月薪150元。

四、从通州、江苏师范学堂两任教习到清学部总务司行走

1902年10月下旬,当时已“名震中外”^①的王国维接受了通州师范学堂之请。1903年(癸卯)正月25日,王国维与一东文教习从上海启程,于27日抵南通,入职张謇创办的通州师范学堂,教授伦理学和国文,其教授伦理学所依据之教材,当为王国维所译、日本元良勇次郎所著之《伦理学》一书,1902年初入《教育世界》社出版之“哲学丛书”。当时通州师范学堂招生主要在通州境内或周边,三成是其他地区学生,设有两年制速成班,学生年费约需七八十元。12月13日由通抵沪,抵浦东码头才发现箱锁脱落,丢失原包百元以及其它物品,则一年所存,几失太半,以至于原本应该支付全盛信资而无法践诺。12月26日始抵盐官。

1905年正月18日,王国维从盐官赴苏州。随罗振玉转任江苏师范学堂教习,南通与苏州两地两任教习具体薪酬不明,但按其时王国维寂然无闻之地位,谅不过数十金。1905年4月5日,王乃誉收到王国维来信,其中即夹带了30元,则月薪似不算低,而且在苏州期间的王国维也开始收藏一些名家书画,此也需有余款才能有此雅兴。不过王国维在任教苏州时,沪上农报馆的薪水似仍可以继续领受^②。略可参考的是:1899年前后,缪荃孙筹备江南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开出的监督年脩六百元对罗振玉也已颇有吸引力^[7](P100)。1901年,沈曾植推荐薛来西、方伦泰执南洋公学教席,他致信盛宣怀建议每人月薪100元^[8](P272),数日后推荐刘峨山编《中庸衍义》,则建议月薪四五十金足矣^[8](P272-273),同年拟荐罗振玉为学堂监督,又总教习、副总教习,月薪皆百金^[8](P282,290)。1902年,沈曾植以皖地清苦,为皖省高等学堂聘请文课总教习,岁脩1200元^[8](P431)。从1899年一校之监督年脩600元到1902年文课总教习年脩1200元,这是一校薪金之高位了。故若南通、苏州两地学堂,作为普通教习的王国维月脩应该不会超过50元。更值得一提的是:1903年底,王国维从通州回上海,在上海码头,因为箱锁断裂,检视之下,居然丢失了积蓄英洋100元,所余仅16元^③。王国维虽报警处理,但谅也难以找回了,则一年所劳,除了日用与生活,所余庶几付诸东流矣。

1905年9月,王国维致信其尊人王乃誉,告知罗振玉可能要入学部,王国维自己也可能随之入京,但随后就知道是罗振玉先往学部。1906年4月中,江苏师范学堂因罗振玉与当地之种种矛盾而宣布解散,王国维遂重回上海。

1907年3月,因罗振玉推荐,王国维赴清学部任总务司行走,并充图书局编译、名词馆协修等职,月脩百金。其上司袁嘉穀《王静安国维别传》云:“回忆光绪丙午,愚长学部编译图书局,静安受聘为局员,月脩百金。”^[6](P247)王国维当时在北京的月用也约需百金^[1](P37),出入略等,故王国维亦时有“长安居尚不易”之感^[1](P35)。其时不只王国维深感生活拮据,连经济条件稍好的罗振玉也有“困于长安之珠桂”之叹^[7](P112)。

从1898年至1911年这前后14年中,王国维走出海宁,先后辗转上海、南通、苏州、北京4地,从报馆书记、兼职翻译到学堂教员、学部职员,月薪大致从12元(20元)、50元到100元,虽然呈现出倍增的趋势,但除了南通、苏州之外,若上海、北京都是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王国维所得薪水,大致只能略敷所用,甚至时或陷于困窘状态。但在这种比较困窘的生活中,王国维的学术也经历了从哲学到文学、从雅文学到俗文学的转变。

① 《王乃誉日记》1902年9月24日记云:“于万丰晤植卿,谓静名震中外。欣合至不可言。”^[3](P1695)此或主要就译述东文而言。

② 《王乃誉日记》1905年8月1日记云:“健拟明日……由硇至沪。整行旅,令于广取五十元作馆膳资之半,其半由静农报馆取也”^[3](P1991-1992)。此时王国维已任江苏师范学堂教习。

③ 1904年1月30日,王国维致信尊人王乃誉云:“迨至码头检视行李……细行查检,失去整包英洋壹佰元及纸卷等物(内有张季直联等),唯另包洋拾陆元及陈枚叔托带洋十二元未失。”^[1](P27)

五、客寓日本京都四年：受赠、编目、编刊与卖文为活

王国维对日本并不陌生，1900年10月20日，王国维在海宁即接友人刘秩庭来书，告知罗振玉用在湖北办农馆的经费，已为王国维游东瀛准备好了旅资^[3](P1320)。10月26日，王国维从海宁启程，于28日到沪，但到沪方知藤田在东京，可能近期到沪，为免行程相左，故延至明春始行。但实际只延期了一个多月。1900年12月初9，王国维再度离海宁赴沪，12月21日由沪与藤田一起，在宁波人马偕陪同下坐三菱博爱丸赴东，于28日抵东京。先入正则学堂，后入私立东京物理学校，因患足痹，须请人治疗，其中有两个星期无法上学。后医生建议回国疗治，从1900年12月21日由沪赴东，1901年4月26日复从东京抵沪，王国维在日本求学的时间前后只有4个月多一点。

1902年(壬寅)3月16日前，王国维致信其尊人，告知罗振玉欲大开译局，需东译三四十人，希望王国维赴日请通汉文译手以任其事。3月26日，王国维乘船前往日本，于30日抵神户转大阪，5月6日从日本抵沪。第二次赴东一个月多一点。

这两次赴东，皆因公出差，故无虑生活问题，但第三次赴东就是因私了。

王国维第三次赴东，自辛亥10月下旬寓居京都至1916年正月上旬回国，在日本历五冬四暑，凡四年余。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仓促之间随罗振玉携眷东渡日本，1911年10月22日到达日本九州门司。时王国维倾囊只有2000元。1912年7月至9月间，罗振玉致信宝熙云：“静安相伴来此，所蓄二千元，略可敲门，日后再徐图生计。”^[7](P6)这2000元已经是王国维的所有储蓄了，只能供在京都暂时安顿之用，罗振玉已经预知“日后再徐图生计”的必要了。生计问题需要未雨绸缪，当年辛亥东渡后的捉襟见肘，应该给了王国维深刻的印象，也成为罗振玉、王国维之间不言而喻的典故。1920年7月6日，罗振玉致信王国维云：“公今年岁入稍丰，宜预为岁寒之旨蓄，漫漫长夜，辛亥去国时之难窘，当引以为炯戒也。”^[9](P505)王国维的储蓄之念，应该也主要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产生的。

按辛亥当时的情况，举家由沪赴东，所需川资大概需要五六百元^[10](P41)。由津赴东，所费大略相等或稍多。王国维如果川资自理，动用储蓄，则所剩就不多了。王国维之女王东明说“辛亥东渡时期的生活，泰半由罗氏供应”^[11](P391)，确乎是一个事实，不过“供应”二字，尚嫌表述粗略，其中还可细分为赠送现金、实物与劳务所得等项。如1915年，罗振玉家中食米将尽，即知会王国维须米几包，以便通函神户同时寄来^[9](P25)，这便是赠送粮食之例。

大致而言，京都的生活程度“与北方略近”^[11](P35)。辛亥前，京城的月用约需百金。王国维居东后，应酬较少，除了衣服等费用之外，一家基本生活月用约70元^[11](P37)。但这是常规的情形，若初至京都，各项生活设施的购置便需另外支付一笔较大的费用了。所以到了1912年9月，东渡不过10个月，王国维已然感到经济的紧张了。他致信缪荃孙说：“维在此间生计尚无把握，叩尽囊底足支一年，此后不知如何？”^[11](P42)王国维在异国的生存危机也由此而来。

好在同在京都还有对王国维关怀备至的罗振玉。罗振玉当时家底尚丰厚，加上所藏书画等物时或售卖日人，经济相对比较宽裕，故能以多种方式资助若干，以助力王国维度过生活难关。具体而言，罗振玉在京都为王国维“徐图生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事：

其一，罗振玉最初每月支付王国维100元生活费。初寓京都田中村，罗振玉为王国维、婿刘季纓、弟罗振常别赁三宅，“月饷各百元”^①，初步解决了生活问题。赵万里也说：“先生之赴海东也，罗先生既为别赁居，仍致月饷而助之。”^[13](P433)罗振玉说为罗振常、刘季纓与王国维三家各月赠100元，此乃属于馈赠，月饷百元的持续时间应在一年左右。

其二，请王国维代为整理编目携往日本暂存于京都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时间一年左右，按月付酬，具

① 罗振玉《集蓼编》云：“予初至京都，寓田中村，与忠恣及刘氏婿同居。屋狭人众，乃别赁二宅，以居两家。时季弟子敬(振常)方任奉天某校教习，复寄资迎其眷属，别为赁屋居之。三宅月饷各百元。”^[12](P59)

体金额不详。书籍凌乱需要整理确乎是一个事实,但由此解决王国维的部分经济困境也未尝不是罗振玉的真实想法。罗振玉此前曾月赠王国维100元以安顿异国之生活,此整理图书之酬劳,或另有支付,也可能包含在每月100元之中。罗振玉晚年撰《集蓼编》言及诸事,凡涉劳务或赠送者,皆标明金额。唯言及当初请王国维在京都大学整理图书事,则未及酬劳之事。其语云:“予寓田中村一岁,书籍置大学,与忠恣往返整理甚劳。”^[12](P60)实际上,此次书籍整理编目主要由王国维完成,今存日本京都大学的《大云精舍藏书目录》等,便是当时王国维的手订书目。

其三,请王国维编校在京都复刊的《国学丛刊》(后易名《雪堂丛刻》),月馈200元。《国学丛刊》创刊于宣统二年(1911),其宗旨“要当以世界眼光,扩张我至美、至深、至完善、至圆明之国粹,不独保存而已,而亦不仅仅发抒怀古思旧之情抱”^[8](P185),后因辛亥事起而辍刊。1914年6月,《国学丛刊》在京都复刊,月出一册,“时忠恣迫于生事,乃月馈二百元请主编校”^[12](P61)。罗振玉复办此刊,当然有学术传古之种种考虑,但顺带解决王国维的生事问题,也当是其中一因。按罗振玉晚年所记,似是罗振玉出资请王国维编纂,但据1914年初罗振玉从上海发给时在日的王国维的信,最初起意复刊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罗振玉信云:

弟在此,与贾人中之有资本者议接续《国学丛刊》(即前所谓《文学杂志》之改变),请公任其事,弟助理之(此时请告小儿等勿宣),月脩百元左右(与索百二十元,尚未定,大约至少百元也),与订一年之约,一年以后,观其销路何如,再行续订。其详细办法,候面谈。此事若定,虽公可免岁余衣食之忧,然又不免写清稿之劳矣。^[9](P17)

此贾人为谁,罗振玉未点明,但从上信,应是沪上资本较为雄厚者。按照罗振玉与此贾人的商议,拟将原《文学杂志》易名《国学丛刊》而复办之。当时沪上具有文学性的杂志主要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不知罗振玉与贾人所议是哪一家杂志?王国维主事月脩在100元至120元之间。能够为王国维找到超过一年的生活费来源,罗振玉显然十分兴奋。只是按罗振玉《集蓼编》所云,如何由当年信中的贾人出资而变成了罗振玉出资,又如何月脩从百元左右变成了200元,是贾人后来反悔,不愿资助,而改由罗振玉直接资助,还是罗振玉晚年记忆有误?如此类问题,尚待进一步考索。

不过复刊也就一年半多一点,从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甲寅出刊8期,乙卯出刊4期,共12期,历18个月,按罗振玉晚年所述,当得酬金3600元。赵万里说:“会吾乡邹景叔安大令为海上西人哈同君致书,邀先生任《学术》杂志编辑之职,乃决于次年返国,而罗先生之《国学丛刊》,至是遂辍刊。”^[13](P433)随着王国维回国主事广仓学窘之《学术丛编》,王国维有了另外的学术发表空间和生计渠道了。广仓学窘主办之《学术丛编》与《国学丛刊》的关系类似“虽停而不停”^[1](P91),大体延续了相似的办刊思路,杂志刊载内容与作者队伍重合甚多,但毕竟属于不同的主事者了。

除了罗振玉明确支付的两笔费用,王国维在日本期间,也通过为《盛京时报》撰稿而月得稿酬30元。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癸丑(1913)年记云:“是岁,日人一宫主《盛京时报》社,邀先生作札记刊日报中,月致束脩三十元,且有时不至,遂解约。”^[6](P428)今检《盛京时报》,公历1913年7月12日至1914年5月5日,王国维以“礼堂”之名,将旅日期间所作读书札记及掌故考证分26次以《东山杂记》为名刊出;公历1914年9月9日至1915年7月16日,又先后以“礼堂”“词山”为名,发表180余则名《二牖轩随录》;公历1915年9月18日至11月28日,以“词山”为名,以《阅古漫录》为名刊发16则。

以上三种不定期连载于《盛京时报》,能月得30元酬金,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王国维在日生活的拮据状态。按赵万里所述,在以上三个时段,王国维大致完成了共22个月的札记撰写,应得酬金600余元。但付出如果不能得到及时回报,王国维自然就不得不解约了。估计束脩“有时不至”的情形大概出现在三种随笔之间。1915年11月底刊载完《阅古漫录》后,距王国维回国时间已经很近,应是自然终止了相关发表。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札记中的不少内容,稍后增写为专文,收入到后来编集之《观堂集

林》中。

此外,王国维还另有书稿酬金,用以弥补家计。如1913年初在日完稿之《宋元戏曲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稿费每千字3元,5万余字,得稿费200元^①。王国维虽以为偏少,但也是无可奈何之事了;再说能将四五年来的研究所得付诸出版,亦堪慰平生。

“卖文为活”确乎是王国维居日期间重要的经济来源,但文价低廉,终究不过是勉强度日而已。1914年3月,罗振玉临时回到上海,深感书画古物交易充满着变数,难以把控,倒是靠文章生活还算稳定,只是要广开卖文之途而已。1914年2月5日,罗振玉在上海致信时在京都的王国维说:

公今幸可卖文为活,弟在此已与一友谈判,大略粗定,乃一文二十元,每月一篇。现在可以旧作充数,以后再想他法。他著作则一页(五十字为一页)三元。大著《明堂考释》及《释币》、《秦汉郡考》均可售去,但抄写甚苦耳。其详容面谈,亦此行所得也。《乡亭考》能于《坠简》成后接续为之,亦妙。前稿售出,即可接售也。^[9](P15-16)

此“一友”是谁?罗振玉出语模糊,尚待考证。每月一文20元的价格,作为生活的补贴,当然是有意义的。何况对于王国维来说,亦如苏轼所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14](P237),世上自如轻松之事盖无过撰文者。罗振玉既为王国维考虑旧稿的出路,也为其规划新稿的方向,王国维的生计始终是罗振玉考虑的方向。当然,罗振玉上海此行更重要的是找到了为王国维生计“可谓一年计”^[9](P16)的方案,即前言拟复刊《国学丛刊》之事。

京都时期的罗振玉经济状况虽较王国维为好,但其实所蓄也不多,加上购书、购书画以及出于传古目的而印制诸多书籍,所费实巨,而收入则勉强持平而已,有时甚至有亏欠。赵万里说:“至是时(1915年底),海东百物腾贵,日常费用渐觉不裕。而罗先生以历年印书,所费甚巨,先生甚不愿有累于罗先生,欲先返国。”^[13](P433)王国维当然深度了解罗振玉的经济状况,所以1916年初毅然回国,虽不无他因,不忍在生计上久拖罗振玉之累,也是其中重要一因。回国后,虽然罗振玉屡次招东,王国维无意再往,也是因为他若赴东,固有切磋学术之乐,然并非毫无生活之忧。可见,生计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王国维的生存方式。

五、余 论

从1898年到1915年这18年中,王国维辗转上海、南通、苏州、北京和日本京都五地,有种种稳定程度不同的职业,相对而言,王国维还算是过着比较纯粹舒缓的生活,即便有家人在旁,也只是应付简单的衣食住行问题,所以他不必大费周折去谋生,可以用最简单的生活支撑自己最愿修之学术。而1916年初从日本京都回到上海之后,生活的内容便不再如前之纯粹,子女渐长,门庭渐广,诸如孩子读书、社会交际、人情来往等,在王国维生活中的比重逐渐加大,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也就不断凸显出来。王国维也不得不从此前比较纯粹的读书研究状态,开始进入相对复杂的社会生活之中,这是把王国维的经济生活以1916年为界而大致区别为前后两期的原因所在。当然,无论在前后哪一期,王国维都不可能用尽所有心力去谋划生事。丙辰之前的王国维多少还是可以无甚挂碍地沉醉在学术之中;丙辰之后,兼顾学术与生活就不得不成为一种常态。我们在梳理王国维丙辰前的生活轨迹与生计特征后,就能明白从家境状况所带来的生活方式与经济观念是根深蒂固的。王国维无意把聚集大量财富作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他在本质上缺乏这种动力和能力。在王国维的世界里,只有学术的召唤才是具有永恒意义的,这也意味着,王国维的一生与财富的关系终究会比较疏阔,只能在若即若离之间。一种简单的生存,一身丰厚的学术,王国维理想中的生活世界和学术世界,大概就是如此了。

^① 1913年1月5日致信缪荃孙:“近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将近脱稿,共分十六章。润笔每千字三元,共五万余字,不过得二百元。”^[11](P45)

参考文献

- [1] 房鑫亮. 王国维书信日记.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5.
- [2] 王国维全集: 第 14 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0.
- [3] 海宁市史志办. 王乃誉日记.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4] 许东雷诗存笺注. 王义胜笺注. 自印本, 2007.
- [5] 上海图书馆. 汪康年师友书札.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7.
- [6] 王国维全集: 第 20 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 [7] 罗振玉手简乙集. 萧文立编注. 稿本.
- [8] 沈曾植书信集. 许全胜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21.
- [9] 长春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王庆祥、萧文立校注.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0.
- [10] 罗振玉手简甲集. 萧文立编注. 稿本.
- [11] 王东明. 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陈平原, 王凤. 追忆王国维.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 [12] 罗振玉学术论著集: 第 11 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
- [13] 赵万里. 王静安先生年谱//王国维全集: 第 20 卷.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9.
- [14] 何遽. 春渚纪闻//全宋笔记第三编: 第 3 册.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8.

An Examination of Wang Guowei's Family Financial Situation and Early Subsistence

Peng Yup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 livelihood and academic work, Wang Guowei's life could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by the beginning of 1916: the first period focused more on academic work than livelihood, while the second period saw a struggle to maintain a balance between the two. Wang Guowei came from an ordinary family, and his annual income was barely enough for his basic needs according to Wang Guowei's own account and the diary of his father Wang Naiyu. Farm rent and housing rent, which were not easy to come by, were the basic sources of support for his family in his early years. Wang Guowei worked as the secretary of the Current Affairs in Shanghai on the recommendation of Xu Jiaxing, but the meager monthly salary frustrated him. Then he had to take a sideline by translating Japanese literatures, which made his livelihood slightly secured. After that, he taught at two normal schools in Tongzhou and Suzhou, and then served in the General Affairs Department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all these offers barely enough to keep body and soul together. After the Revolution of 1911, Wang Guowei went to Japan with Luo Zhenyu and lived in Kyoto for more than four years, making a living by sorting books, editing and publishing journals and writing, etc. Living a stable yet frugal life, Wang Guowei managed to make ever greater academic achievements. As survival comes before academic work,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cognize how Wang Guowei weigh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livelihood by analyzing his family financial situation as well as his livelihood in his early years.

Key words Wang Guowei; Luo Zhenyu; *Current Affairs Report*; *Guantang Jilin*; Tongzhou Normal School; Kyoto

■ 作者简介 彭玉平,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 广东 广州 510275。

■ 责任编辑 何坤翁